



建鄼文史



1105/35

建 邺 文 史

第 三 辑

政协南京市建邺区委员会

封面题字 武中奇

封面摄影 茹 辛

封面篆刻 石云孙

建 邺 文 史

编辑: 政 协 南 京 市
建 邺 区 委 员 会

印刷: 雨 花 印 刷 厂

写在前面的话

建邺区，是古都南京市的老城区之一。为了再现其历史风貌，发掘文化遗产，借鉴过去，启迪后人，从中得到裨益，我们于今年年初，发动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，积极组织撰写和广泛约稿，认真做好《建邺文史》第3辑的出版准备工作。目前，经过各方面的艰辛努力，已撰写、征集了文史稿件43篇。现遴选其中23篇史料文章，编印成册，以飨读者。

在此，我们对提供资料和稿件的各界人士，以及对区政协的文史工作，给予支持、帮助的有关单位和个人，表示衷心感谢！

在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对书中的重要史实，查阅了有关历史记载，进行了反复核对、修改，以求资料的真实可靠性；但是，由于我们历史知识贫乏，更加水平有限，难免存在缺点、错误，敬请读者批评、指教。

政协南京市建邺区委员会

1988年12月5日

目 录

写在前面的话 建邺区政协

工商·交通

曲折发展的“透明”企业

——记南京玻璃厂的演变 邓瑞祥 (1)

难忘的六年

——在南京市民银行工作的回忆 傅 森 (9)

一家突起的百货商店

——我的创业经历 李春华口述 宗浩然整理 (21)

昔日昇州路的故衣行业 王继贤 (26)

沦陷之年米与盐 雷甫鸣 许自强 (28)

解放前的南京公共汽车 许自强 (31)

丁振记人力车行 一 鸣 (38)

军事·政治

军统局的特工训练班 李鹤生 (42)

汪伪保甲制度缩影

——记沦陷时期的南京第二区公所 王 国 (45)

文化·古迹

南方大学的变迁 杨酒亭 汪经武 邓瑞祥 (48)

我在南京五中的八年 张一之 (52)

漫话“成美”学馆 南京市24中校史编写组 (58)

- 古四眼井 李冠群 许自强 (65)
“英王府”与当年的西城 王 正 (67)
治山之麓卞壶墓 李冠群 王继贤 (70)
翁同龢故居 王 正 (72)

人物·地名

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前进

- 记基督教主教王光训 单于越 (76)
慈善家周一渔先生 何兆钧 (82)
“七家湾”的掌故 许自强 (85)
“南市楼”溯源 兴 宗 (87)
赛虹桥的由来 方诚修 (89)

宗教信仰

- 石鼓路天主堂修女史话 雷甫鸣 刘宗甲 (90)
佛教经幢“佛顶尊胜陀罗尼”
——关于建邺区出土经幢的考证 ... 蒋齐华 范家刚 (94)

曲折发展的“透明”企业

——记南京玻璃厂的演变

邓瑞祥

在南京的汉中路上，有一家工厂的厂区楼房，装饰华丽而又雄伟，迎街高耸地矗立着。这就是闻名遐迩的、位于建邺区境内的国营“南京玻璃厂。”

该厂创办于1951年5月。从开始筹备，到正式开工生产，仅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。当时工厂的设备，极其简陋，工艺水平也较低下，只能生产两种简单的玻璃器皿（玻璃茶杯和热水瓶胆）。全厂共有职工80多人。它原是一个由股东合办的私营企业。

股份企业有限公司

这个企业，是由27名股东组成的“股份有限公司”。公司设立“股东会”，并由股东会选举产生“董监事会”。当时董监事会的成员，由董事和监察9人组成。凡有关公司的重大事项，均须经董监事会讨论决定，并定期向股东会汇报执行情况。

经过共同商讨，企业定名为“南京玻璃厂”。根据董监事会的决定，企业的经营管理，由经理负责。第一任经理是股东裘在兹。后因裘脱离私人股东，参加革命工作，董监事会遂另推派三人，分任经理、副经理和副厂长、资方代理人。此

后，工厂的业务活动，主要由其三人负责。

连年亏损 难以为继

工厂自1951年6月，正式开工投产以来，因生产资金不足，曾由股东三次增加投资；到1953年4月，企业资本由开始时的人民币3亿元（当时的1亿元即后来的新人民币1万元，下同），增加到10亿元。此时，全厂职工已有179人。每月生产热水瓶胆4400打、玻璃茶杯3000打。

但是，由于股东急功近利，计划不周，开工匆促，特别是企业管理制度不完善和经营作风不端正，从而迟滞和阻碍了生产发展；再就是选派的两名车间负责人极为不当，他们在工人中作威作福，引起了工人群众的不满。因此，厂内比较混乱，企业生产，每况愈下。热水瓶的产量，由每月4千多打，降至1、2千打；而且由于质量低劣，造成瓶胆和药瓶成批爆炸。先后建立起来的两座玻璃熔炉，也因不能使用而报废。不得已，特地从上海请来技师指导，熔炉才算建成。真是“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。”后来，又由于把生产热水瓶胆的煤气发生炉设备，委托一家毫无经验、又无技术根据的私营“唐兴铅铁厂”制造，终因煤气炉不合设计要求，运转不够正常，而无法投产，致使厂里工人，长期闲着无事可干。几经折腾，使生产遭受很大损失，经济上也带来了很多困难。

在工厂濒临倒闭的危难时刻，工人们积极帮助厂里克服困难，不分昼夜，加班加点，日以继夜地辛勤劳动。但当时工人的生活环境和住宿条件，却是很差的。左所巷的厂职工集体宿舍，又小又挤，夏天热得难以入睡，工人只好宿在露

天里。饭堂是一个无窗户的茅草房，冬天冷，夏天热，卫生条件极差。建厂时，全厂没有一个厕所。于是，就地挖个土坑，放进一口坏缸，上面铺几块木板，作为职工公厕。虽然工人们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，没日没夜的拼命工作，但厂方缺乏具体的体贴和同情，因此工人的积极性，受到了一定影响。由于种种原因，企业生产上不去，工厂仍然处于半停工状态。因此建厂第一年，就亏本4亿5千万元。

1952年因企业亏损，资金周转困难，又加1951年开始“五反”后，有的资方人员，情绪不高，经营消极，生产不景气，终于被迫停工一个多月。后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，银行给予贷款，百货公司实行包产包销，才恢复了生产。尽管如此，但到年底结算，仍亏损了3亿元。

偷工减料 瓶胆爆炸

1953年1月，工厂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，2月份开始民主改革，选举工会，建立党、团组织，成立了厂治保委员会，加强政治思想工作，逐步改善企业管理，生产有了转机。年终盘点盈利5亿3千余万元。这是建厂以来，第一次扭亏为盈，工人奔走相告，全厂皆大欢喜。

1954年初，南京市委派工作组到厂检查工作，帮助进行思想教育和建立制度。厂部成立了生产、财务、供销、总务等组，加强了对企业的生产领导。根据上级指示，并与厂方协商，定于1954年10月1日，工厂实行公私合营。但因负责工厂生产的业务管理人员，为了赚钱发财，不按工艺要求，偷工减料，随意更换“料单”，甚至以不同性质的原料，代替标准用料，粗制滥造。故又一次造成了热水瓶胆的大爆炸事故。

因而，公私合营日期推迟。由于发生了质量事故，产品不能销售（南京百货公司已通知停止包销），企业无收入，经济上再度陷入困境。中共南京市委和建邺区委组织联合工作组，再次来厂指导，发动工人对资方个别人员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；同时领导工人、技术人员，改进配方，试制新产品，尽快发展生产。为了渡过难关，厂工会组织职工和资方开劳资双方协商会，商讨搞好生产的新门路。然而，有的资方人员却撒手不管，要政府解决。并借口国外有存款，要求为其出具出国取款证明，想逃之夭夭，溜之大吉。职工代表当然不答应。他又谎称：到上海亲友处，保证能借到1亿元钱。结果，一周后两手空空回厂。工人们议论纷纷，说他是存心想搞垮工厂，使工人失业，向政府施加压力。在市人民政府的再次支持下，人民银行贷款7亿多元，用以支付煤、电费用和工人工资。国营灯泡玻璃厂还派工程师来厂作技术指导，改进原料配方，提高产品质量；百货公司也恢复了产品收购，使生产得以继续进行。可是，有人在生产中，又重演了偷工减料的伎俩，产品质量不合格，因而报废瓶胆8万6千多只，造成了经济上的亏空；再加上停工的经济损失，1954年又亏本10亿多元。至此，该厂自建厂以来，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，总计亏损15亿元以上，占原有股东资本20亿元的75%。

公私合营 欣欣向荣

1955年1月，工厂实行“公私合营”后，企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。工人以主人翁的态度，积极参加企业的生产和管理，劳动热情空前高涨，生产定额不断突破，企业转亏

为盈，面貌焕然一新。1956年4月，经南京市地方工业局批准，将公私合营的南京玻璃厂同公私合营的南京联华玻璃厂、私营民主厂、良友厂，以及瓶塞厂等10个零件手工业合作社，合并成“公私合营南京玻璃厂”。并厂中，在厂名和商标(牌子)问题上，曾有过一番争论。根据党对资方上层人物的统战政策和各厂具体情况，经上级对联华厂做说服工作，最后决定厂名为：“公私合营南京玻璃厂；”热水瓶商标定为：“丰收牌”。其时，公方厂长：张玉棣中共党员）。

工厂合并后，全厂共有职工669人，资金（含国家投资）55万3千多元，年产值38万余元。总厂厂部设在原南京玻璃厂，下设一、二、三分厂和橡胶附属车间；有玻璃熔炉6座。1958年，企业有了较大发展，全厂已拥有职工2065人，熔炉13座，年产值达到587万元。为了便于管理和更好地发展生产，经工厂研究和上级批准，将一分厂和橡胶附属车间划出，另外建立工厂，即现在的“南京保温瓶厂”。这时的南京玻璃厂，还有二、三分厂和新成立的耐火材料厂，共有职工1214人，熔炉8座，资金86.5万元，年产值1000万元。

在党的领导下，全厂职工发扬工人阶级主人翁的精神，干劲十足，生产蒸蒸日上，不断刷新记录，提前完成任务。为进一步发展生产，党总支陈书记在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上，号召大家：要进一步搞好增产节约工作，把劳动竞赛有领导地开展起来，同时还要做好职工的劳动保护和生活福利，以及防暑降温、奖励工作。工人们听了很受鼓舞。为了响应号召，尽快改变设备简陋，技术力量薄弱，手工操作，劳动强度大，生产效率低的落后面貌，全厂职工掀起了学文化、学技术的热潮。工人们白天上班，晚上到职工业余学校学文

化。尤其青年工人，拜师学艺，勤学苦练，互帮互教，努力掌握本职业务技术；大家动脑筋，想办法，改进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，为实现生产机械化、半机械化，改变手工作业方式争做贡献。1958年，全厂动员，“苦战百日”，掀起了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热潮。因陋就简，土法上马，终于试制出“土洋结合”的吹杯机、自动筛料机、自动磨砂机、自动量水器、机器印花，以及送料车子化等，还有自动关模子、冷气自动排气，自动加料等革新项目，从而减轻了劳动强度，提高了工作效率。与此同时，还试制了16个新产品，其中有三、四个产品，已正式投产。技术革新，使工厂发生了可喜变化，不仅提高了机械化的程度和生产能力，增加了产值，而且还培养了一批技术工人。公私合营后的南京玻璃厂，从1955年到1960年，共上交国家利润927万元。

60年代初，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，全厂职工认真贯彻党的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，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，不叫苦，不畏难，以增加生产和节约用煤的实际行动，力争多创利润，支援国家建设，减轻国家负担。为提高产品质量，工厂成立了技术监督科，对产品建立理化性能的检验制度；还积极设计、改进熔炉结构，降低煤耗，并实行按炉定量，用煤过磅等办法，千方百计节约用煤。在全厂职工的一致努力下，较好地完成了企业的生产任务。

坚持生产 多做贡献

在十年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“四人帮”鼓吹“停产闹革命”，批判“唯生产力论”，置国家和人民利益于不顾，大肆破坏生产。但工人们还是自觉的坚持生产岗位，努力为国

家创造财富。1976年，江青反革命集团，加紧了篡党的阴谋活动，极力破坏社会秩序和生产秩序。在社会动乱的非常情况下，和国家燃料、原材料供应紧张的艰难时刻，工厂和广大工人，摔掉“四人帮”的精神枷锁，想方设法，克服困难，坚持生产。这一年，虽未完成国家经济指标，但没有亏损，还上交给国家利润6千6百元，利润虽小，但在当时，却也算是难能可贵，来之不易了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全厂职工齐心协力，面貌大变。1977年打了一个“翻身仗”，总产值由1976年的496万元，跃升到803万元；利润总额为75万多元，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。1978年，企业在电力、燃料和原材料供应不足的困难面前，积极努力，多方寻求支援，仍然完成了主要经济技术指标，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。

大步前进 榜上有名

1979年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，全厂职工大步前进。这一年，企业第一次产值超过1千万元，利润超过100万元。国家规定的八项经济技术指标，取得了“满堂红”，全面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。其中有10个单项指标，创造了本厂历史最好水平。随着企业的发展，职工福利也得到了改善，其中直接发给职工的奖金将近13万元，比1978年增加了15倍多；留作建职工宿舍的福利金10万余元。由于全体职工的努力，年终被评为先进企业。

1980年以来，企业经过整顿，生产稳步发展，产品质量逐年上升，经营管理日渐走上轨道，社会效益更加明显。1980年完成工业产值1220万元，利润137万余元；产品

质量，在华东6省玻璃器皿竞赛评比会上，获得了印花杯、刻花杯和总分三个第一名；企业再一次被评为先进单位。1985年，钢化玻璃器皿获国家银质奖；1988年又获国家外贸出口产品金质奖。

随着时间推延，如今南京玻璃厂，已是初具规模的国营新型企业。有职工1570人，固定资产原值898万元；产品分五大类，有几百个品种；年产值2000万元，利税总额256万元。目前该厂在党的改革经济体制，搞活工厂企业的方针政策引导下，正以新的姿态，投入到企业的改革之中，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，不断地前进着。

（根据南京玻璃厂厂史整理）

难忘的六年

——在南京市民银行工作的回忆

傅森

1931年初至1937年下半年，我在南京市市民银行工作六年多，现离休在青岛市四方区。回首往事，历历在目。兹忆述有关情况如下：

寻觅生计 只身独闯南京

1931年，我从江西来到南京找工作。可在当时的社会，谋职业谈何容易。开头几个月，虽经四处奔波，求亲告友，但工作、生活仍无着落。在山穷水尽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无可奈何，我就去找太子系——行政院长孙科的秘书长梁寒操帮助。他资助我四十元钱，叫我办个报。于是，我与一个名叫上官树芬的福建人，创办了“民声通讯社”和“民声报”。主要内容是，反映市民生活和工商业情况；并以“哀我流亡的同志”等进步文章，来批判揭露国民党某立法委员“召我流亡的同志”的反动言论；对一些小有名气的官僚和买办资本家，凡给我们资助者，就在报上吹捧一番；不给资助者，我们就在报上给他难看。就这样维持了四个月的生活。后来“广州非常会议”组委会主任吴求哲，到南京市当市民银行行长，他善于投机和拉关系，因我表姐夫陈行是中央银行的总裁，他就聘请我到市民银行去当市库主任、出纳主任、后

为该行副行长。

因为有了固定职业，我就把父母、弟、妹、妻、女，从江西接到南京，住在今建邺区管辖的升州路程善坊。从此，我有了安身之地，工作、生活较为安定。

市民银行 官僚金融机构

市民银行共有职员二十多人，行址设在南京市建邺区陡门桥一栋小平房里，面积约有五、六百平方米，但是一个长方形的房子很不实用。我到银行后，就积极向吴求哲建议另找地方或扩建。吴同意后，我托南京亨得利公司王经理（宁波人）帮忙，在南京白下路找到一栋两层楼，面积约三千平方米的房子。经粉刷装修后，外观阔气大方，内部设施也很别致、讲究，所以很能吸引人。楼上为行长、副行长室、接客和会议室等；楼下为营业部，具体分为储蓄、总务、会计、出纳、市库等六个科。职员也随之扩充到五十人左右。他们之中多数与市府官员有裙带关系，如亲戚、朋友等。我也把堂弟的师兄弟吴德生安排在行内做出纳员。银行规定，每天中午要照常营业，因此要求：每天中午科主任以上人员，统一在行内就餐；职员则要自己带饭。

市民银行属南京市官办性质，既是银行，也是南京市机关的金融库。因此，该行直接由当时的市长马超俊领导和掌握。所以，可以说有了国民党南京市政府，就有了南京市民银行。银行主要靠全市的各种捐税筹集资金。如自来水费、电费、房捐、屠宰捐、车马捐等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，每月进款近百万元。此款大多用于市政建设和教育事业等，每月开支约有八、九十万元。

在银行内，有一个十多平方米的现金库。库内除存放机

动现金不超过五万元外，还有借条、有价证券、金银条以及粮帐等。因此，对市库钥匙的保管、提款手续和警卫等方面，要求都很严格。当时金融库的钥匙，只有我一人保管。平时凭行长亲笔签发的取款单到市库提款。如发现有不符档案笔迹者，我就拒付。为了安全起见，配有四个武装警卫，拒台也不一般，足有一米半高。另外，在我办公桌下还安装了一个警铃，发生紧急情况时，只要我脚踩电铃，警卫、公安人员就会立即赶到处理。

然而，这个名曰“市民银行”的官办银行，实则不务正业。打着银行的幌子，而从事营私舞弊，投机钻营的非法勾当。从南京市长、本行行长到每个职员，无一例外，都从肮脏的交易中，捞到了不少油水。所以，在职员中，虽然按籍贯大体可分为广东人和本地人两派，但由于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关系，因此在对外做投机生意和维护本行利益等方面，基本上是同流合污、彼此勾结、一致对外的。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，由于该行的“后台”硬，因此一般单位和公务人员，是不敢惹的，它是一个地地道地有权有势的官僚金融机构。

投机取巧 个个中饱私囊

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，为了支撑局面，掠夺和榨取劳动人民血汗，在南京设立了中国银行、中央银行、农业银行、新华银行。由于经济萧条，各银行大量发行纸币，造成通货膨胀，物价上涨，民不聊生。市民银行虽不发行纸币，但参与了投机倒把和剥削人民的罪行。市长马超俊特地从香港银行调来亲信、广东老乡黄思颐，当市民银行副行长，专门负责对外的